

苏联模式 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马龙闪 / 著



苏联模式 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马龙闪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 马龙闪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 - 7 - 5495 - 4190 - 4

I. ①苏… II. ①马…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苏联-文集 ②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文集 IV. ①D751.2-53
②D6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7707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 杨志友

责任编辑: 刘冬雪

装帧设计: 赵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25.5

字数: 390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前 言

现在,摆在案头的这本书,笔者取名为“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的探索”。围绕着这个题目而成的这些篇章,原本是无心插柳而形成的一个系列。涉笔这个题目,原是一个偶然的引起的。本来无意,没想到,从第一篇写起,后来竟是一篇、两篇地一路写下来,最后成了这样一个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是怎么发端的,倒也不无意义。笔者原本是研究俄罗斯近现代史的,侧重于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那么,怎么就由此转入了“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这个题目了呢?

这,原是由一个偶然机遇引起的……

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由文及史,由史及文,从苏联问题及于中国问题,由中国问题及于苏联问题,将二者联系、贯通起来,也是学界常常发生的事;况且,中苏两国的问题又有如许之多的可比性,这样将二者沟通、贯穿起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这仅仅是从学科之间的关联性来说的。

但学科之间的关联性是一回事,能不能具体把二者贯通、联系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具体的偶然事件做助力来推动这一沟通的实现,实际上人们还是会各自固守一方,与另一学科领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况且,过去和现在有多少从事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学者,都是固守在这一方乐土之上,一直辛勤耕耘、自得其乐呢?

在我国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学者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潜规则:主张仅就苏联史研究苏联史,仅就苏联问题研究苏联问题,并不提倡拿苏联史问题同中国史、中国问题作比较。这里有诸多原因,主要是怕触及敏感神经。

之所以如此,既是为人们可理解的过去那种学术政治气氛,也是和中苏两党、两国革命在历史上形成的那种人尽皆知的关系相联系。

促使笔者打开这个禁区,消除这个潜规则的,是这样一件事:2006年年底,北京社科联机关刊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发来一封邀请函,邀笔者前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会议的题目是“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研讨会主办者规定这个题目,本身就把苏联模式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是会议“规定”的这个题目,逼着笔者把苏联问题与中国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为准备这篇论文,笔者专门研读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也研读了《邓小平文集》关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一系列论述,还翻阅了中共党史的有关著作,把中国社会主义探索问题与苏联模式作比较,形成了一个发言提纲。在会上就此题目发言后,会下又马上接到编辑部的约稿,要求就此发言题目成文,并预定在2007年第1期刊发。写这样的文章,说实在话,对笔者而言还是第一次,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写成后,题目确定为“‘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实质性突破”。没想到,此文作为该刊2007年第1期封面上头版文章发表了,也就是说,是该刊2007年第1期的第一篇。接着,该文又被上海《报刊文摘》于同年3月14日摘登。不久,又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社会主义论丛》同年第5期全文转载。由此见出,社会对这类文章是需要的,反响也是积极的。

不久,在这年5月,作者应邀参加“全国第二届社会主义论坛”,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会上就此发言后,上海《社会科学报》于2007年6月7日将全文发表。接着,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7年6月11日“思想理论”版又予以详细摘要刊登;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文摘报》“学林漫步”,也于7月15日刊发了摘要。

学术思考原是有一定惯性的。此后,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笔者又先后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和《学习时报》连续发表了同一类型的一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得到了包括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经济网、中青网在内的二十多个网站的全文转载,有的文章还引起了论争。

上面这些情况表明,我国舆论界和理论界对有关中苏问题比较研究的文章还是欢迎的。理由显而易见:从苏联史研究的视角考察中国问题,从苏联模式的视角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获得一个独特的、有利的考察问题的视角。这个视角,能给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提供一个纯粹做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不易达到的观察角度。正是这个特定的视角,使笔者觉得应该把这类题目继续做下去。

将中苏问题、中俄问题进行比较,当前最重大、最有现实意义的题目之一,就

是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比较。进行这种比较,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了解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领域;进行这一比较,可以为未来的改革提供思考的路径和着力的方向。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①后来在1985年8月,他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革”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③小平同志的这些言论说明,从新时期改革一开始,他就是从消除苏联模式的弊端着眼,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来思考、设计中国改革的整个蓝图的。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并进入攻坚阶段,对苏联模式采取什么态度,对它是革,还是保,是继续超越、突破苏联模式,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还是维护苏联模式,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混同于苏联模式,就成了对待改革态度的分水岭,也成了是继续改革,把改革推向前进,还是停滞改革、阻挠改革、反对改革的试金石。正是苏联模式、斯大林问题对中国改革有这等关联,由这些问题引发的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人们在改革问题上的思想起伏和波动。正是这个缘故,为近些年中国现实的改革问题所牵动,一些人力图把改革纳入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因此被斯大林、苏联模式等问题撩动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情结,引发了围绕这一问题的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包括俄罗斯近年是否存在“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而俄罗斯近年对斯大林的评价到底是什么含义,是重建俄罗斯大国地位而对“铁腕”的一种呼唤,还是某种向苏联模式的回归;这些争论也包括“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问题,是内涵相同的同质关系,还是突破与被突破、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包括苏联意识形态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是斯大林严厉控制意识形态,垄断真理,制造僵化教条提供了条件,从而成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赫鲁晓夫的“解冻”放松了意识形态控制,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条件。近年,学术界还发生了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

一个重要争论:究竟存不存在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对待这种价值及其产物——人类文明的成果?这实际上是苏联思想文化史上早就提出过的一个问题,即庸俗社会学及其所受到的批判的问题。此外,我国学术界早就存在民粹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国革命和建设存不存在民粹主义的影响,苏联模式中存不存在民粹主义的根源?所有这一系列问题,近些年都无一例外地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因此,也在对现实改革问题持不同态度的人们中间,引起了激烈争论。

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都关系到我国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即要不要继续坚持改革,怎样继续坚持改革,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是进一步革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继续突破这一模式,还是回到苏联模式中去;若继续坚持改革,特别是坚持政治体制和大文化体制改革,要不要吸取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普遍价值,等等。这些,几乎都与上述问题密切关联在一起。

这些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和争论的问题,本书各篇大体都包罗了进去。书中这些文章大都是在近年学术论争中写就的,中心围绕着“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的探索”,大体可分为七个专题:一是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二是俄罗斯是否存在“重评”斯大林问题;三是苏联的“大清洗”及其评价;四是苏联意识形态与苏联剧变的关系;五是俄国民粹主义及其影响;六是有关苏联庸俗社会学批判与人类文明价值;七是俄罗斯文明的特性。这七个专题除围绕着中国改革、“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斯大林体制模式间的关系,近些年所发生的一连串学术争论的相互关联外,还贯穿着一条内在的“红线”,这就是目前中国改革的方向和道路问题都这样那样地关联着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一切关注当今中国改革的人们,对这些问题都应该弄个清楚明白,否则,在我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就会失去清醒头脑,变得摇摇摆摆,也就不能继续突破苏联模式,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把继续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进行下去。

本书涉及的上述问题大多具有论战性质。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论战双方的分歧所在,也可从这些争论的问题中窥见我国近些年学术争论的一斑。

在本书付梓前夕,作者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今社会思潮的激荡”。该文论述了当今中国存在的社会思潮以及反映这些思潮的思想理论争论。在谈及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必然性和客观性时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社会思潮呈现多样化态势,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体制深

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接着,该文把当今中国社会思潮激荡背景下发生的思想理论争论,主要概括为八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八大争论”,即“普世价值思潮与反普世价值之争;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和目标之争;南方谈话不同解读之争;苏联解体和斯大林是非之争;‘文化大革命’评价之争;转基因科学与人类社会伦理之争;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成败之争;民族主义和南海问题之争;等等”^①。这个概括或许有这样那样不尽完善或准确之处,但它大体近似地反映了我国近年来思想理论界和学术文化界主要争论的状况。

读者若留心一下本书内容所涉及的论争,甚至哪怕只是过目一下目录中的七个专题及其文章标题,就能了然,上述这“八大争论”中,其中有三四项就直接或间接地同本书论题相关联;而且也不难看出,本书在争论中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这一主流思想,表达的是体制内的一种观点。

常言道:“观一叶而知秋。”从直接的意义上说,这是就对自然界现象的观察而言的;在学术上,如果一个学者能够不断回应社会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做出相应的反应,大概在某种程度上,或者从某个特定的侧面,也能够通过这些文字“观一叶而知秋”。如若笔者近几年在学术上的不懈思考和耕耘所收获的这些篇章,能够成为人们通过某一学科侧面透视学界争论的一斑,并可由此观察改革的起伏涨落状况,正像呈现在眼前的一片秋叶可以展现整个秋色一样,也就没有辜负时间给两鬓抹上的白霜,庶几可使笔者颇感欣慰了。而若这些篇什能够成为人们在秋高气爽时节,观山赏景中万树丛中的一片带点亮色的红叶,那就善莫大焉,幸甚幸甚哉!

谨将此书献给读者,唯此愿望而已。

作者

2010年10月

改定于2013年5月

^① 赵智奎:《如何看待中国当今社会思潮的激荡》,《环球时报》,2013年3月25日。

目 录

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	15
不能混淆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内涵	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	28
应坚持“突破论”,否定“混同论”	34
破解中国模式成功之“谜”	38

俄罗斯近年是否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思潮

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	
——对俄罗斯近年出现的所谓“重评思潮”的剖析	46
再论所谓俄罗斯的“重评斯大林思潮”	60
俄罗斯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吗	
——兼谈《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对斯大林的评价	78
对俄罗斯是否存在“重评”斯大林思潮之争的思考	
——兼谈应该怎样对待学术争论	88

苏联“大清洗”运动及其评价问题

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大清洗”运动始末	102
苏联战后的思想政治清洗运动	114

2 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	127
也论“大清洗”的是非和性质	148
社会政治运动后遗症与苏联剧变	156

苏联意识形态与苏联剧变

苏共意识形态的演变与苏联的兴衰	164
苏共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一夜之变”	190
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	198
日丹诺夫与苏斯洛夫臧否之辨 ——与严秀、蓝英年二位先生商榷	212
苏斯洛夫其人与苏联意识形态的衰变	221

俄国民粹主义及其影响

一种“经典的”民粹主义	236
俄国民粹主义与“超阶段”社会主义	245
论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的政治纲领	254
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	269
苏共的“超资本主义”倾向及其历史根源 ——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	288

苏联庸俗社会学批判与人类文明价值

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兼论否定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理论根源	300
关于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批判 ——对批判发起人和发生时间的考释	316
什么是庸俗社会学和庸俗社会学派	325
重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大思潮 ——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挫原因的分析	344

俄罗斯文明的特性

俄罗斯文明的特性	360
破解俄罗斯难题的视角:圣愚和“圣愚崇拜”	371
俄国传统社会主义与民主	
——从“俄国社会主义”到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	376
附: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文明属性看法的问卷调查	384
结束语:应分清中俄两国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斯大林问题”	387

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脱胎于苏联模式的。邓小平最初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特色”所指,也主要是对苏联模式而言。正是这个缘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逐渐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关系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 21 世纪,是仍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架之内,还是实事求是地把它看作对苏联模式的超越?是仍然把它混同于苏联模式,还是应该如实地肯定它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如何,关系着对目前我国改革深度的评价,也关系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这正是最近几年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止的缘由所在。

《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一文,着重阐述的就是苏联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间的关系。此文针对某些学者认为 1956 年《论十大关系》就是真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开端的观点,提出:直到“文革”结束的 1976 年,也就是说直到毛泽东同志的晚年,他也“没能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思想的束缚”,中国事实上还在苏联模式的框框内打转儿。“我们真正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破苏联模式,开始与之发生实质性决裂的,是邓小平同志。”也就是说,是在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文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深刻认识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后果。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曾丢弃“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理论创造;他虽不断致力于探索,但生前基本上没有摆脱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樊篱。只有到了邓小平同志时期,才实质性地突破苏联模式,真正开创了改革开放和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新境界、新天地。这一观点同党的“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观点,是完全相符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一文,除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面外,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对苏联模式超越、突破之所在。这些超越和突破表现在:1.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2.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创造,而对苏联社会主义“超

阶段论”的突破;3. 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4. 实事求是,从提高人民生活 and 民生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对苏联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超越和突破。

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就整体而言,是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超越和突破”这一认识,在 2008 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即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前夕,笔者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一文,是对国际上特别是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模式”评述的回应;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震惊世人的辉煌成就,“这些昭昭然的事实,向世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也有别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崭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因此,我们中国学者应该研究“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并有理由向世人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

在阐述“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把“中国模式”混淆于苏联模式,混同两种社会主义模式内涵的问题,因此笔者在《不能混淆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内涵》和《应坚持“突破论”,否定“混同论”》两文中驳斥了这种论点。在庆祝新中国六十华诞,欢呼辉煌成就的声浪中,一些国外人士提出了中国成就之“谜”。这一“谜底”何在?《破解中国模式成功之“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解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死结”。这个死结曾困惑苏联七十四年,也曾束缚中国人三十年,事实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明确论述过的,列宁还试图在实践上通过新经济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斯大林囿于俄国民粹主义的传统观念,囿于其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情结,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看不到它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相依存、相统一的一面,因而拒绝利用资本主义给人类提供的应该加以继承的文明成果,开始了半个多世纪一味反对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厮杀,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从 1949 年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直到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才以他无比的天才和睿智解决了这个问题。

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要坚持邓小平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深刻认识苏联模式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关系,必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苏联模式中挣脱出来,并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实质性地突破苏联式社会主义而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深刻认识这个问题,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左顾右盼,摇摇摆摆,甚至走回头路。正确地认识苏联模式同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还是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是极其重要的。

一、对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放弃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领土广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同时,也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① 依据这一理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将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626页。

的社会”。^①

在写成于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光辉著作中,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纲领。毛泽东以此教育全党,中国革命就是要建设并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及其成立初期,这一新民主主义思想和理论深入人心,它告诉人们,新中国成立就是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新社会。建立于当时的青年团,其名称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是要让青年一代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确定的五星国旗图案,就是象征共产党领导以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然而,到1952—1953年前后,人们突然获知要进行“三大改造”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关心我国发展道路的人们所萦怀于心的。

现在,这一问题已基本清楚,并且也可以公开谈论了。这一巨大转变,就其外因来说,是受斯大林的压力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就其内因来说,是由于我们革命者常有的革命急性病。我们自身的急性病问题,人们是比较清楚的;而对于1948—1950年间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共 and 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来自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强大压力,人们至今往往还不甚了了。

这种强大压力是同在斯大林指示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批判、攻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苏联为适应与美国对抗的需要,弥补共产国际解散后活动的空白,同时也为加强约束、控制东欧各国党,于1947年9月在波兰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坚持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按照本国的国情,制定适合自己本国具体情况的政策,也由于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中,南斯拉夫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不甘心做苏联的经济附庸等原因,苏南关系迅速恶化。苏联领导人为迫使南斯拉夫屈服,对南共采取了强硬蛮横的高压政策。铁托不肯屈服,进行了顽强抵制。这样,斯大林便于1948年3月从南斯拉夫撤走苏联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接着,联共(布)中央又致函铁托,全面指责南共领导人及其内外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苏南关系。1948年6月,苏联通过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对南斯拉夫施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632—633页。

压。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会议在联共(布)代表的操纵下,批判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反苏反共”,指责其走上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甚至把铁托打成帝国主义的“间谍”,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造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在此情况下,从1948年六七月起的一年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与此同时,其他压力也纷至沓来,在指责南斯拉夫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也把铁托指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制造大量边境事件,号召并策动推翻南斯拉夫革命政权。

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源于铁托的独立自主和坚持走自己道路、抵制苏联模式的行动。斯大林这样做,其用意也在于震慑一切敢于违逆苏联道路和模式,企图独立自主的东欧国家和其他党。

此时,刚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面临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也从批判铁托事件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解放战争及之后一段时期的毛泽东也曾为斯大林所不信任,被斯大林怀疑为“铁托第二”。毛泽东在事过境迁七八年之后,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此事时还说:“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①很显然,这“压力”就是指1948—1949年斯大林指示共产党情报局批判铁托和制裁南斯拉夫,而给毛泽东和中共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斯大林在二战刚刚结束,企图维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时,曾要求东欧各国根据大国协议,建立本国的多党联合政府,维持人民民主政权;而发生苏美对抗,出现冷战局面时,又要求东欧各国建立共产党一党政权,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而这时,斯大林无疑也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同样的要求。1949年6—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期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把“人民民主专政”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宣布:“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同时,还表明,“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②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在访问苏联时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最初回应。

后来,由于我们自己也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如果说最初是由于斯大林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1369—1370页。